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

[英] 约翰·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

[英] 约翰·雷 著

熊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英)约翰·雷著;熊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532-0

I. ①造… II. ①约… ②熊… III. ①博物学—研究
IV. ①N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05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

[英]约翰·雷 著

熊 姣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532-0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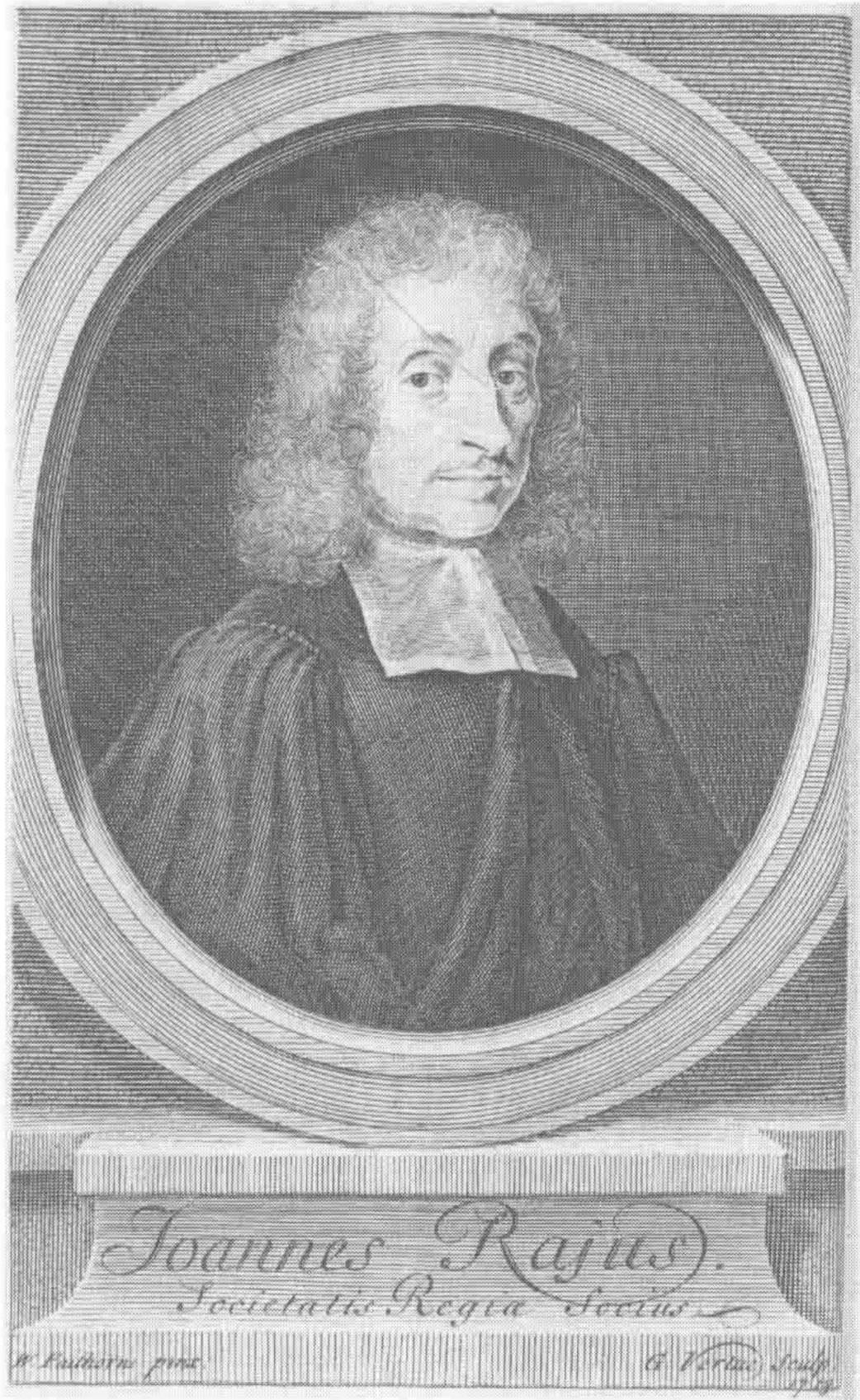
定价:40.00元

John Ray

**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

by London: William Innys, 1717

根据伦敦出版商 William Innys 发行 1717 年修订第 7 版译出



约翰·雷(1627~1705),英国博物学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者序

约翰·雷及其博物学著作

《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是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 1627—1705)晚年的一部著作,也是英国十七、十八世纪再版和重印次数较多的博物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既是英国自然神学的代表之作,也是对当时的博物学知识最丰富、全面的论述。约翰·雷的博物学著作在其同时代及后世的博物学家中均具有深远影响,对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对当代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神学进路、环境伦理运动,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从两个方面来说,《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在约翰·雷的博物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一,其中汇总了他博物学生涯中的全部研究,包括兽类、鱼类、鸟类、昆虫、植物、矿物、地形、天体等各方面的内容,就材料而言,不仅有他个人广泛的旅行考察所得,也有前代及同时代的本国博物学家和欧洲博物学家的观察和论述;第二,在这部著作中,约翰·雷首次有意识地将自然神学与博物学联系起来,将信仰体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博物学观察材料的基础上,并公开论及他对某些形而上学和伦理问题的看法。

尽管约翰·雷的博物学在西方起到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博物学之父”和“英国的亚里士多德”,但是国内



一直缺乏系统研究,对他的博物学著作缺乏了解。科学史界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读者。为了避免某些仍然持有“现代性”偏见、一见“神”的字眼就嗤之以鼻的读者将《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视为陈旧的宗教小册子,或是仅出于对近代早期“质朴的”自然探索活动的一种猎奇心理而接近这部著作,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1. 约翰·雷生活的时代背景;2.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宗教与哲学语境下,他的人生际遇又是如何为他开启从事博物学研究的契机;3. 他的博物学著作,尤其是这部《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中包含的主要观念。

—

无论在英国史上,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而言,17世纪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留下的遗产,使文化、教育和图书出版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技术改良和海外扩张给英国社会带来一股涌动的新生力量。英国社会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纵向的流动性加大。与此同时,宗教教派之间的争端始终影响着英国社会的稳定。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后,查理一世即位不久,便施行亲法政策,引起英国新教徒的敌视。英国资产阶级与一批新贵族联合起来,展开了反对国教的清教运动。1636到1638年之间,宗教迫害扩大到苏格兰,苏格兰集会宣布取消共同祈祷书和主教制。1639年,英国王室在与苏格兰的交战中以失败告终。查理一世于1642年逃离伦敦,至此,英国内战爆发。一方是保皇党派,另一方则是由费尔法克斯、曼彻



斯特和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议会军与苏格兰长老会签署“神圣联盟合约”，取得苏格兰军队的协助，并于1644年与保皇党派展开内战中规模最大、最激烈残酷的一次战役——马斯顿荒原战役，一举击溃王党军。1649年，“残余议会”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宣布实行一院制，废除君主制。同年，议会军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指定其子理查为护国主继承人。1659年，理查解散议会，放弃护国主称号。1660年，驻守英格兰的英军总司令乔治·蒙克率军南下，兵不血刃地进入伦敦，迎接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回国即位。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一度试图缓和天主教与清教之间的矛盾。然而在1661年至1665年间，由骑士党组成的议会连续向政府提出恢复英国国教的法令，加紧对不从国教者的宗教迫害。其中1661年的“市镇机关法令”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宣誓服从现任政府，按照国教仪式作礼拜；1662年的“划一法”要求所有不信国教者服从圣公会教义；1664年的《非法宗教集会法》要求神职人员一律承认国教教义，宣誓服从国王和国教会；1667年公布的《五哩法案》禁止所有不宣誓的教士回到自己过去的教区，并不得在有市政府的城市及其周围五英里之内活动，违者处以罚款，或是收监羁押。这些宗教法令不仅使一些僧侣被剥夺了圣职和俸禄，也直接影响到当时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的人事变动，以及学术研究氛围。通常认为，牛津是保皇党的重镇，而剑桥掌握在议会党手中，氛围相对较为开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对牛津和剑桥进行了清理，目的在于恢复议会党执政时期遭到驱逐的国教神职人员的职务，同时确立那些在王位虚空时期接受任命，但是接受国王



回归的神职人员的地位。

查理二世在位期间,伦敦于1665年爆发了自1348年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瘟疫,并于次年遭遇大火。英国与荷兰舰队在海战中的失利,进一步激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二世即位。詹姆斯二世的亲法政策引起人民的恐慌。由于害怕天主教卷土重来,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三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史称“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确立。

在此期间,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并未影响英国科学取得显著进步。新思潮的涌现与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一方面撼动了坚不可破的旧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也促使知识精英对自然界展开广泛的探索,试图从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基础,替代传统上经院哲学与教会为人们提供的心理慰藉。在这种科学探索活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1660年,雷恩与波义耳、威尔金斯等人在早期“无形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旨在推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学术交流学会。几位主要发起人凭借与查理二世的亲密关系,使学会得到国王正式认可,分别于1662年、1663年、1669年获得三个特许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由国家批准的科学团体。早期皇家学会的成员多数是声名卓著的自然哲学家,一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此外也包括一些从事与自然哲学相关职业的人,例如医生、大学或中小学教师、学者及旅行者。早期会员几



乎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除数学等学科之外,皇家学会也资助各种人文研究。早期皇家学会还是一个绅士俱乐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天才人物与哈克(Theodore Haak)和迪格比(Sir Kenelm Digby)等钻研牡蛎养殖和怪物生殖的业余爱好者友好合作。在这种开放、折中的开明气氛下,英国学者普遍采用一种不同于法国笛卡尔主义先验演绎体系的经验研究方法,遵循培根主义的指导,收集了大量广泛的观察材料。尽管17世纪后期皇家学会关注的重心逐渐向数理科学方面转移,然而在整个17、18世纪,博物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为后来博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简单概述了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科学活动氛围后,再来说说约翰·雷个人的情况。

作为牛顿的同时代人,约翰·雷与牛顿分别被视为十七世纪英国博物学传统和数理传统的代表。英国的科学史家评论,约翰·雷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相当于与他同年出生的波义耳在化学方面的成就。然而与波义耳不同,约翰·雷并非出生于显贵之家,他的一生也更加曲折。约翰·雷生于英国布瑞特伊(Braintree)附近埃塞克斯一个宁静的小乡村,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母亲则熟悉草药知识,在当地很受人敬重。约翰·雷早年曾被父母送到埃塞克斯一个语法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他的出色表现引



起布瑞特伊教区牧师柯林斯的注意,并由科林斯推荐,于1644年以“减费生”(sizarship)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同年6月,由于学费资助问题,约翰·雷转入凯瑟琳学院,随后于1646年重新转回三一学院。1646年与约翰·雷一同转入三一学院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后来牛顿爵士的导师巴罗(Issac Barrow)。1648年约翰·雷与巴罗一同毕业,并留校任教。1649年,约翰·雷成为三一学院的初级教授,并在1651—1656年分别担任希腊语讲席教授、数学讲席教授和人文学讲席教授。1657年他担任了“praelector”(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在毕业仪式上引领学生的人)。如前所述,当时剑桥处在议会党控制之下,较之牛津学术氛围更为开明。学者们从事教职之余,通常有一些业余的爱好,由此形成一个热衷于从事自然哲学和实验研究的小圈子。

约翰·雷最早开始博物学研究,是在1650年前后。据他自己说,当时他生了一场“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疾病,医生建议他尽量多外出散步。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雷发现了大地上的植物之美,并领悟到植物学研究给人带来的愉悦。他如是表述道:“在旅途中,我有大量的闲暇去思考那些总是出现在眼前,而且经常被漫不经心地踩在脚下的事物,也就是各种美丽的植物,自然界神奇的作品。首先,春天草地上丰富的美景吸引了我,使我随即沉醉于其中;接着,每一株植物奇妙的形状、色彩和结构使我满怀惊异和喜悦。当我的眼睛享受着这些视觉上的盛宴时,我的心灵也为之一振。我心中激起了对植物学的一种热情,我感觉到一种成为这一领域专家的蓬勃欲望,从中我可以让自己在单纯的快乐中抚平我

的孤寂。”^①这种“单纯的快乐”带给他极大的慰藉,然而当他希望进一步了解眼前的美丽事物时,他失望地发现,这一时期剑桥根本不重视这门学问,在这里根本找不到一位“指导者和启蒙老师”。前人著作主要是为了满足本草学家和药剂师的需求,依据这些著作中“简短模糊的描述”,很难准确地辨明作者所说的是何种植物。面对这种困境,约翰·雷认为,如果听任自然哲学和博物学中如此可贵而且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完全处于被忽略状态”,将是十分可耻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地区进行大量探索,广泛涉猎当时的植物学著作,包括古典文献,以及国内外本草学者和园艺家的著作,并结合亲身的观察实验,考证前人著作中提到的植物。

自1650年开始,约翰·雷经过6年的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在剑桥书商的建议下,1660年,他匿名出版自己的第一部植物学著作《剑桥植物名录》(*Catalogue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随后于1663年将剑桥周围新发现的40多种野生植物名称整理成《剑桥名录增补》(*Appendix ad Catalogum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从剑桥地区出发,约翰·雷逐渐扩大他的研究范围。与此同时,他的植物学研究逐渐取得广泛认可,在他的学生中间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批热爱博物学的年轻人开始加入他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威路比(Francis Willughby)、斯基庞(Philip Skippon)和考托普(Peter Courthope)等人。从相关材料来看,威路比不仅拥有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家

^① John Ray, *Catalogus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 London, 1660, p. 22.



世,而且确实“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有过人的天赋和能力”。约翰·雷称赞威路比在各方面学习中均有优异的成绩,尤其是在那些“最抽象、最令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学科”(指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至于在自然哲学,尤其是动物志[鸟、兽、虫、鱼]这方面的能力,不说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海外,我也不曾见到任何人在这方面具有如此广泛、全面的知识。”^①无论这类评价是否过誉,威路比在约翰·雷的博物学生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对约翰·雷而言,威路比不仅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且是在他最窘迫的时候提供庇护的资助人。1660年,约翰·雷与威路比约定共同研究自然界中的各方面,约翰·雷负责考察植物界,威路比负责他更感兴趣的动物界(按照早期的划分,整个动物界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

不幸的是,宗教和政治风波不可避免地波及了剑桥的小天地。三一学院有很强的宗教背景,约翰·雷进入剑桥的初衷,原本是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在传统上,三一学院的教职人员在升职的同时必须接受神职任命。议会军执政时期取消了主教制,因此约翰·雷一直未曾接受圣封。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约翰·雷一度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在信中写道:“……我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必须接受教会的封授,否则生活会很不稳定,我在此间的生活来源就只能靠其他人帮助了。我并不打算进入教阶,因为即便能留下来,这里也没有我希望从事的工作。如果要我告别自己钟爱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研究和活动,献身于教士职务,并接受他

^① Francis Willughby, *Orinithology*, London, 1678, Preface.



们所谓的神学,我想我最好还是将自己放逐到乡野中去,像其他人那样为世俗世界服务,并把执行牧师之职作为我的工作。”^①出于某些考虑,同时也由于剑桥大学的挽留,约翰·雷最终还是在伦敦接受了神职封号。随后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使约翰·雷深感失望。1662年的“划一法”直接在剑桥掀起了一股躁动不安的浪潮。依照法令,所有神职人员必须签署一份合约,承认1644年议会军与苏格兰长老会签订的《神圣同盟和合约》具有不合法性。尽管约翰·雷并未表现出明确的清教倾向,但是他认为“宣誓始终是宣誓”,如果让他在这份合约上签字,“无疑违背他的意愿,纯粹是出于恐惧”。由此,他拒绝在《划一法》上签字,失去了剑桥的教职。林奈学会的创始人史密斯认为,约翰·雷既不愿接受国教会的晋升,也不赞成分离派脱离国教会的分裂行为,原因很可能是“他厌恶大半生中目睹的纷争与狂热”。史密斯评价道:“约翰·雷的原则和情感远远超越了当时标志着正统与异教之分的种种刻意的差异,他的心灵并未沾染上那些狂热者的激情。他的洞察力使他感到很遗憾:那些人刚摆脱一个重要的共同敌人,就陷入了内部的纷争。两派都曾针锋相对地声称约翰·雷是自己的盟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幸。”^②

约翰·雷失去教职后,在威路比的帮助和陪同下,继续四处旅行考察。他的考察范围从英国各处延伸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大陆国家,获得丰富的博物学材料。1666—1673年间,约翰·雷

^① R. W. T. Gunther (ed.), *Further Correspondence of John Ray*, London, 1928, p. 16.

^② E. Lankester (ed.), *Memorials of John Ray*, London, 1846, p. 85.



多数时间居住在威路比家位于米德莱顿(Middleton)的府邸。在此期间,他受邀为威尔金斯的《普遍文字》(*Real Character*)编写植物学部分的目录,并于1667年成为皇家学会的正式成员。依照皇家学会的章程,他与威路比一同进行了一些实验并向学会提交报告,例如1669年发表在《哲学汇刊》上的“树木汁液流动实验”(Experiments Concerning the Motion of the Sap in Trees)报告。约翰·雷在与时任皇家学会秘书的奥登伯格的通信中,谈到很多有趣的博物学论题,包括蜘蛛吐丝的方式,蚁酸使花朵变色的现象等等。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不幸:1672年,威路比英年早逝。威路比指定约翰·雷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并请约翰·雷代为教育他的孩子。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约翰·雷带来沉痛的打击。不过,他接受了命运安排给他的任务,留在米德莱顿府邸,充当威路比孩子的监护人,并整理在旅途考察中获得的材料。威路比逝世后不久,约翰·雷在文中多处提到的“可敬的威尔金斯主教”也溘然长逝。友人的相继离去使约翰·雷备觉孤单。经过审慎的考虑后,他与威路比儿子的家庭教师玛格丽特结为夫妻。威路比的母亲去世后,威路比的遗孀改嫁他人,约翰·雷在米德莱顿的日子日益艰难。于是,当约翰·雷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他重返故居,在当年父亲去世后他为母亲修建的房子里度过余生。威路比在遗嘱中给约翰·雷留下60英镑的年金,保证了约翰·雷后半生的生活,使他有闲暇继续去从事博物学研究。他的婚姻和稳定的家庭生活,也为他的博物学提供了保障。在他晚年疾病缠身,无法再远足的岁月里,他的太太和几个女儿都成了他的助手。一直到

